

琴棋春秋——我的音乐生涯

60
年

吴育绅

著



人应该有一个立身之本

人也应该有一个爱好

有了琴和棋

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感觉过寂寞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琴棋春秋

——我的音乐生涯
60年

吴育绅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琴棋春秋 : 我的音乐生涯60年 / 吴育绅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7.9

ISBN 978-7-5008-6812-5

I .①琴… II .①吴… III .①吴育绅—自传 IV .①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21664号

琴棋春秋：我的音乐生涯60年

出版人 芮宗金

责任编辑 李丹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栾征宇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：100120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82916 (职工教育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996 (010) 82075964 (传真)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50千字
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2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 一

悠扬的琴声激励人的奋进，精湛的棋艺陶冶人的情操。在中央芭蕾舞团近六十年的辉煌历程中，有一位优秀的音乐家，他就是原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著名中提琴演奏家、教育家吴育绅先生。

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提琴演奏家，吴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首席，后又担任交响乐团团长，其间还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任中提琴教师。他所带领的中芭交响乐团成功演绎了众多经典保留剧目，举办了各种类型的音乐会。他精心培育的几代优秀中提琴演奏员，均就职于各大交响乐团。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演奏家和教育家，吴先生的教学著作为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。

如今年近耄耋的吴先生仍心系艺术的发展，为中国交响乐教育事业不懈地努力着。中芭为能有吴先生这样优秀的音乐家而骄傲！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吴先生真情实感的流露，看到他对中芭的热爱、对音乐事业的不懈追求、对学生们的孜孜教诲和殷切期盼。让我们带着对他的美好祝福，一同走进他精彩的“琴棋春秋”！

中央芭蕾舞团团长、艺术总监 冯英

序 二

应邀作序，荣幸之至，这是我与育绅大兄的缘分。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在 1964 年的全国棋类锦标赛上。那次全国比赛是围棋、中国象棋、国际象棋三个项目同时进行，在杭州六公园的华侨饭店足足搞了一个月。那个年代三项棋比较弱小，平时比赛少，一搞就大张旗鼓地搞。半个多世纪前的情形，回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。

当时育绅代表北京队参加国际象棋比赛，但他竟然不是北京队的在编队员，而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在编中提琴手，这着实令人称奇，成为参赛棋手们的热门谈资。我当时 15 岁，就读于上海青少年体育学校，进专业队是我那时的目标。见到育绅这样的成功大哥，并且是“双枪将”，我就格外尊敬了。

第二年，国家围棋队正式组建。它与集训队的最大区别在于，调来的队员是调入行政编制的。我很幸运，在那一年刚调入上海队三个月，就又上调北京了。不料正当踌躇满志之时，就遭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起先还只是训练大受干扰，不久就波及项目本身，围棋项目成了“封资修”^①，队伍被迫解散，包括我在内的 7 个“种子”被下放到北京的工厂当工人。

^① “封资修”指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、修正主义。

然而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——这个厄运却成全了我和育绅的神交。我有缘接触到“固定调”“首调”“视唱练耳”“乐章主题”等全新领域，懂得了汽车鸣笛声的音高要素。而且我小时候就对小提琴充满憧憬，当然就忍不住“利用”一下育绅这个近水楼台。而对于育绅来说，天上掉下个围棋老师，恐怕也是未曾梦想过的，他的棋瘾和棋力随之大涨。我俩亦师亦友，不会再有比这更加贴切的概括了。

育绅大半辈子的棋瘾都在围棋上，国际象棋得了个全国二十几名后就金盆洗手了。其中原因，书中的描述十分精彩。而今我另抛破砖，博行家一笑。都知道管乐、键盘乐的音高是事先设定好的，演奏者不能突破。这和国际象棋、中国象棋的性质有相通之处，如老帅不能死，车的战斗力最大，士不出九宫，等等，都有规则，不能突破。而围棋规则至简，棋子不分等级，自由落子，最后以全局占地多寡决定胜败，是平等自由的局戏。弦乐特别是提琴，也有类似围棋的无拘无束，育绅钟情围棋有没有这层因素呢？

浏览书稿之后，我的最大感受是，育绅非常幸福。育绅从小就喜欢音乐，而且他有素质，肯努力，也有机遇，最后成为大家，为热爱的事业添砖加瓦，可谓人尽其才，发挥了正能量。能够享受这种模式，是最幸福的人生。

兴趣爱好是人生的重要内容，能够使之丰富多彩，充实有益。兴趣爱好还是一种目标，是工作之外的另一种追求。“有目标的人更健康”，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常识。可以说，育绅的健康人生受益于围棋，今天被让九子，就要琢磨上手凭什么？被让到六子了，又要想办法怎么升到让五子、四子？这个过程就是享受人生，也是一种脑运动。“生命在于运动”，这话脍炙人口，道理不错，我认为还应该加上“生命在于脑运动”作为补充和

完善，而兴趣爱好就是很好的脑运动。

成功人士留下个人的历史很有意义。他们的成功经历无论可否复制，起码档案价值毋庸置疑，一般而言，也有励志的功效。成功人士的个人历史，往往是相关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记述成功人士的经历也是反映相关事业的一种视点。

育绅将亲身经历形成回忆录，这是将幸福的感受与大众分享，将感恩的心情回馈于社会的自然反应。整本书反映出了健康平和的心态，恰如其人之平素，而文风尤为朴素，实事求是，可读性强，必须点赞。

北京围棋基金会理事长 华以刚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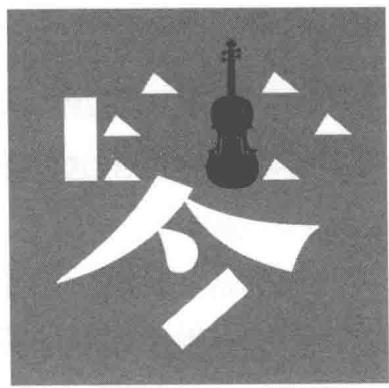


- 音乐之路的启程 / 002
我的妻子薛学行 / 008
我的儿子小中和小央 / 015
我的姐姐们 / 026
中芭乐队的四位老指挥 / 035
芭蕾舞剧音乐与中提琴声部 / 041
中芭乐队的几位铜管演奏家 / 046
中芭乐队的木管声部 / 052
指挥家卞祖善 / 057
老友金以宏 / 062
师兄姜克 / 066
老大哥李文泽 / 070
大提琴家孙宝琪 / 073
作曲家程恺 / 080
小提琴家夏三多 / 085

中芭的四位画家 / 089
出访欧洲 / 093
台湾之行 / 097
两次担任指挥 / 100
两次担任乐队首席 / 104
司徒兄妹 / 108
隋克强教授和赵惟俭教授 / 113
中提琴家何君恒 / 118
翻译《中提琴艺术史》/ 124
三届中提琴演奏会 / 131
两位“老学生” / 138
第一位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 / 143
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们 / 148
中央民族大学的几名学生 / 151
三位摇滚青年 / 156
刘勇 / 162
宋丹秋 / 166
张金春和他的中提琴独奏音乐会 / 170
三位来自社会的学生 / 177
两位记名学生 / 182
这十年教过的孩子 / 186



- 从沈阳到北京 / 194
1964 年的全国棋类比赛 / 200
认识围棋 喜欢围棋 / 205
两盘没有下完的棋 / 212
百花奖围棋邀请赛和首都文艺界围棋联谊会 / 217
中日文艺界围棋交流（上）/ 223
中日文艺界围棋交流（下）/ 228
“棋圣” 聂卫平 / 234
刘文龙与卜大炜 / 238
赵玉生与武兆宁 / 242
网上下棋 / 248
- 后记一 也说说我老爸 / 252
后记二 琴棋春秋 / 257



音乐之路的启程

1952 年，我从沈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毕业，考入沈阳市第十七中学。入学不久后，学生会改选，我被选为学生会文艺部长。直到毕业前，我一直担任这一职务。

1955 年的一个夏日，学校里教音乐的杨申如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给我一张音乐会的票，让我去看当晚东北音专附中的演出。当时我对音乐并不感兴趣，但因为是老师的安排，也就从命了。

那天下午，我先去学校参观了校史馆。那时的东北音专，校舍是建成不久的崭新楼宇，琴房、音乐厅、宿舍、食堂一应俱全，看起来很是壮观。在校史展上，我看到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人与学校师生的合影，颇有大开眼界之感。

原来，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（简称“鲁艺”），曾经的学院领导有成仿吾、吴玉章、周扬等，后来鲁艺迁到了东北，其中的音乐部分出来成为东北音专。这是一所中学大学连读的学校，学制是高中四年、大学五年，院长是作曲家李劫夫先生。

那时候，我就读的十七中学只有初中部，学校的教学楼也很破旧，跟东北音专相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晚上的音乐会更是让人耳目一新，



有小提琴、长笛、二胡独奏，弦乐四重奏，钢琴四手联弹，还有独唱、小合唱、大合唱，这是我第一次到音乐会现场，看得我如醉如痴。之后，我又听人介绍说，读这所学校，学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全免，这对我可真是挺有吸引力的，我当时就下决心要报考东北音专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天的活动，其实就是东北音专招生办举办的，意在吸引我们这些中学生前来报考。

我当时的文化课成绩还不错，几乎全部是满分。考试成绩单上记载着：语文5分，俄文5分，几何代数5分，物理5分，地理5分，历史5分，体育5分，音乐5分，化学4分，美术4分。

可现实的问题是，我什么乐器也不会啊！

这时我忽然想起我的二姐夫，他在长春的时候曾经跟一位日本音乐家学过小提琴，后来到沈阳办了一家音乐传习所。我决定去找他学习小提琴。

我在二姐夫的音乐传习所学了一个月小提琴，拉《霍曼小提琴基础教程》第一册，然后就去参加考试了。音乐基础理论的笔试、口试，我的成绩都是优秀，但就是小提琴演奏的水平太低了，记得主考老师听完都笑了。

等到8月发榜的时候，我们班有四位同学非要跟我一起去看榜。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，分别是葛宝仁、关树人、王来洲、郭吉宾。对于考东北音专这件事，我虽然心里没底，但也不担心，因为以我的文化课成绩，可以去沈阳二中读高中，那也是一所名校呢！

那一年，东北音专在全国设了四个考区，分别在上海、大连、哈尔

滨和沈阳，其中沈阳考区录取 11 名考生。我正溜达着看榜，一起去的同学大叫起来：“有你！有你！”我们凑过去一看，我的名字下面还有个括号，括号里写着“专业：二胡”，这可太让我意外了！同学看到学校的环境后，特别羡慕地说：“什么专业都行啊，这么好的学校！哎呀，你真是太幸运了！”

我清楚地记得，在上一次去听的音乐会上就有二胡独奏，是一名高一学生演奏刘天华的《良宵》，很好听。既然我要学这个专业了，余下来的暑假时间里，我就去找二姐夫教我拉二胡。他算是个音乐多面手，什么都会一点。

结果到了开学的日子，到学校的乐器室领乐器的时候，老师发给我的居然是一把小提琴。我很诧异，心想老师弄错了吧？老师看我神情有异，问：“你是不是叫吴育绅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老师说：“签字，把乐器拿去吧。”我当时十分激动，因为从内心深处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小提琴。

我的第一任主科教师是靳延平教授，他从小在哈尔滨师从俄籍教授特拉赫·田贝尔格学习小提琴，但我只跟他学习了一年。

1956 年，我升入高二。有一天，附中校长徐惠民教授找我谈话，希望我改学中提琴。

我问：“为什么要改学中提琴呢，是我的老师对我不满意吗？”

徐校长笑了，说：“不是的。我们新请来一位中提琴专家，要开设中提琴专业了。你们班四名学小提琴的孩子中，有三名都是女生，相对来说手小，身体也弱些，你来改学中提琴比较合适。再说，你可不要认为改学中提琴吃亏了，这个专业目前还没有专业人才，将来无论是毕业留校当老师，还是到艺术团体当演奏员，都有更多机会，小提琴可就不然了……”



就这样，我遵从校长的安排，从1956年开始，跟着俄国老师依基尔·德贝尔学习中提琴。德贝尔老师身材高大，性格却很和蔼，从来不对学生发火。如果你回课达到了他的要求，他就会给你多留一些作业。如此这般，我便习惯于每次回课都让他满意，我学中提琴的兴趣就越来越高。1957年，全国开始了反右运动，德贝尔老师就移居澳大利亚了。

1958年“大跃进”年代，我也跳了一级，从高三直升大本，那时学校已改名为沈阳音乐学院，院长依然是作曲家李劫夫先生。对于这个名字，今天的人们可能不熟悉了，但他的作品，像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等，在当时真是家喻户晓。记得有一天上午，我正在一楼的琴房里练习《马头琴之歌》，没想到李劫夫院长推门而入，对我赞扬了一番，原来他路过此处，在门外听了好一会儿了。

在德贝尔老师离开中国之后，我跟着王德荣教授学了一段时间的小提琴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王老师指导我练习了拉罗的《西班牙交响乐》小提琴协奏曲以及莫扎特第三、第四小提琴协奏曲。

待到1961年，关庆武毕业留校担任中提琴教师，我又到关庆武班上继续学习中提琴。其实关庆武是我的师兄，在附中时比我高两年级，在我之后一年跟德贝尔老师改学中提琴，但是毕业比我早。

然而，我和关庆武学习的阶段很快就结束了，原因是我的女友薛学行态度鲜明地反对。以前关庆武没有改学中提琴时，和她同为阎泰山老师的学生，所以她对关庆武比较了解。薛学行说：“每次老关回课的时候，阎老师都很不满意。你跟他上课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帮你找了王德荣老师，王老师答应你到他那里继续学习。但是王老师对中提琴教材不是很熟悉，你得自己挑选一些作品来练习。”

1962 年，我读大四，参加了沈阳市三项棋类比赛，获得了国际象棋冠军。当时的辽宁省棋队和黑龙江省棋队都希望我能加入，做一名专业棋手。黑龙江省棋队还特意派出曾获得全国比赛亚军的张东禄，专程到沈阳来与我商洽。我当时也挺想当专业棋手，但这必须要学院领导同意才行，于是我陪着张东禄去找李劫夫院长。

记得李劫夫院长在一栋漂亮的独栋小楼里办公，他听了张东禄的来意后，明确表示不同意。他说：“中提琴这个专业的人才，目前国内非常匮乏，各大交响乐团和音乐院校都很需要，怎可半途而废？再者说，吴育绅已经得到沈阳市冠军了，也算棋界高手了，我看不需要再去专门下棋了吧？”我跟张东禄只能悻悻而归。

在 1963 年的毕业考试中，我演奏了中国乐曲《闹元宵》《草原上》，外国乐曲《格鲁吉亚舞曲》《浪漫曲》和布宁 G 大调协奏曲。那次毕业考试是在学院大礼堂进行的，薛学行特意坐在评委后面，把我的演奏从头到尾听完了。之后，她对我的表现大加赞扬，说发挥得相当不错。



薛学行在毕业演奏会上独奏 (1963 年)

事后的某一天，有一位老师提起这次考试，无意中说道：“你那天演奏得确实不错，可惜关庆武给你打了 3 分，否则你不会只评为 4+ 分的。”



结果，在我们那一届毕业生里面，只有薛学行得到了5分，我是4+分，李晰^①是4分，甚至还有得3分的。

就在毕业考试结束后的不久，有一天，学校人事处的老师找我和薛学行去办公室谈话，告诉我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他说：“那天你们的毕业考试，辽宁歌剧院的领导和交响乐团的指挥首席都来听了，从咱们这届毕业生里面挑中了三名学生，有你们俩，还有李晰。我们知道你们俩谈恋爱，这是很好的结果。可是就在昨天，我们又接到文化部来函，指名要吴育绅去北京，到新成立的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（即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）去。现在就得你们自己来做选择了，是两个人一起去辽歌呢，还是一南一北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学校会尊重你们的意见。”

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当然是选择两个人在一起，干嘛要劳燕分飞呢？可是，薛学行明确表示让我去北京。她说：“你去了北京发展，以后我也有可能去。但是如果我们都留在沈阳，就再没机会到北京去了。”这时，老师在旁边提醒说：“想进北京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你们最好考虑好再做决定啊。”薛学行说：“如果三年我还不能有机会调进北京，你再回沈阳也行啊。”

正是由于薛学行的坚持，我来到了北京，在中央芭蕾舞团整整工作了41年，直至退休。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薛学行，最终在1973年调入北京电影乐团，虽然比她预计的晚了7年，但不得不说，在我们人生的大走向上，她的把握是很准的。

^① 李晰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歌舞团，后来调到山东省艺术学院任教。